

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

丁念金

【摘要】 当前中国的校本课程决策负有重要的文化使命,其原因有:中华文化复兴的需要;深层的育人需求;学校发展的需求。使命的主要构成有:协助传递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促进文化精神更新;促进文化的丰富化。履行使命的主要途径有:在校本课程中突出上述文化精神内涵;重视校本课程决策过程本身的文化特性;整个学校文化建设充分考虑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

【关键词】 校本课程决策 文化使命 原因 构成 途径

【作者简介】 念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上海 200234)

课程决策是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对教育的目的与手段进行判断和选择从而决定学生学习怎样的课程的过程,它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构成课程开发的完整的运作过程。当前我国中小学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校本课程开发,而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一个本质区别是课程决策上的区别:校本课程的决策是在学校层次进行的。广泛的学术研究者普遍认为,课程与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课程研究中的概念重建主义特别深入地认识到这一点。^[1]作为当前中国情境下这种密切联系的重要方面之一,校本课程决策应该载有重要的文化理想,负有重要的文化使命。

一、校本课程决策负有文化使命的原因

在当前的中国,校本课程决策负有极为重要的文化使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1. 中华文化复兴的需要

众所周知,中华具有悠久而辉煌的文化发展历程,创造了灿烂的传统。然后到后来,中华

传统文化的发展几乎停滞下来,到19世纪早期,更是进入了龚自珍所说的“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鼯声,夜之漫漫,旦不鸣”^[2]的“衰世”。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启动,这是“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运作下,全面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3]直到现在,中国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在创造着现代性文化。

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大难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问题。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在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中,中华传统文化由于一直处于劣势,加上其它原因,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完满的传递,而是先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动摇,而后变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又致使支离破碎的中华传统文化濒于毁灭。目前,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一些碎片,而正是在当前,中华民族又面临新的背景:一方面,面临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文化全球化中,西方文化居于显著的优势地位,如果中国不复兴中华文化,那么只剩下碎片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陷入进一步消失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又尊重和追求文化的多元化,这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校本课程决策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9YJA880086)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比较教育学”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J50404。

要求复兴中华文化,并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复兴中华文化,正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严峻的任务。

如何复兴中国文化呢?关于此,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主张,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西学中源”说与中西文化调和论;“东方文化”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体文化”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论;“儒学复兴”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造论。笔者赞同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主张:“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4]当前,在中国大力提倡校本课程决策,这是课程改革中的一大创新。校本课程决策正是文化综合创造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个领域在中华文化复兴上有着重要的使命。

2. 深层的育人需求

课程的根本目的是育人。育人不仅包括浅层次的知识技能传授,还应该包括深层次的发展人性。关于后者的重要性,我国台湾教育学家贾馥茗强调:教育要以发展人性为本。^[5]要完成浅层次的知识技能的传授,通过一般性的教与学的活动即可;而要在深层次上发展人性,则需要从文化上着手。文化能够为人提供一种影响人的心灵的情境条件,使人吸收这种情境中的价值、精神,将之内化为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特性,并发展智力。人们经常说人是文化的产物,就是这个道理。从微观上讲,每一个人的人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人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作用的结果;从宏观上讲,人性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进化的结果。“文化,虽然它本身是人所创造的,但它使得独特的人类心智的工作成为可能。学习和思维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情境之中并依赖于文化资源的利用。甚至个人在特性和心智使用方面的多样性,也部分地归因于不同文化情境所提供的机会

的多样性,尽管文化情境不是心智功能多样性的唯一成因。”^[6]

3. 学校发展的需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学校大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时期。而文化建设在学校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里的文化建设即学校文化建设。首先,学校文化是学校发展的重要目标指向,因为,学校文化是一个学校之质量品位的重要方面,而且代表着整个学校的形象。正如珍妮·奥克斯和马丁·利普顿所强调的:“学校即文化。”^[7]从另一个角度说,学校发展都要指向形成学校个性这一目标,而“学校个性的本质是文化个性”。^[8]其次,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内容,因为任何学校都应该发展其特有的文化,而且学校各项建设都要渗透一定的文化精神。再次,学校文化建设是整个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学校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时空范围内进行的教育”,“学校文化是一切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力”。^[9]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建设和发展学校文化呢?这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校本课程决策。这是因为:首先,校本课程决策形成本校的课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其次,校本课程决策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过程,它是学校行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的主要构成

从中国文化的变迁、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校本课程决策在整个学校发展中的地位来看,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最主要的构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协助传递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促进文化精神更新;促进文化的丰富化。

1. 协助传递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

如上所述,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总的来说是要通过综合创造,而这种综合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传递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在此,校本课程决策有着不可推卸的部分责任。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优秀要素呢?这非常复杂。我们认为,文化包括两个基本层次:一是文化精神,即人类社会生活中积淀起来的基本的人类精神,这是一种文化的基本的气质和倾向;二是文化形式,即渗透了人类基本精神的社会生

活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行为形式、器物形式、制度形式、思想形式、文本形式和社会心理气氛形式等。中华传统文化优秀要素的传递,当然也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优秀成分;二是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中各种表现形式的优秀成分。其中,最根本的是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优秀成分,因为“文化精神是一种文化的核心、本质”。^[10]那么,此中的优秀成分有哪些呢?对此,人们已做了长期的探讨。不过,在探讨过程中,人们的主张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有人则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较多地持肯定的态度;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优秀成分的分析概括上,也是见仁见智。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有许多成分确实是消极的,甚至是不健康的,但也有积极成分。

其中最重要的积极成分是以“崇高”为最高价值。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精神。如果说西方文化中最高的价值是“自由”,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是“崇高”。在此,“崇高”主要有如下含义:其一,道德高尚;其二,受人尊崇、受人推重;其三,地位优越。^[11]对“崇高”的价值追求,是可以而且值得传递的,因为,“崇高”可以成为一种永恒的价值,而且可以作为主导价值,统领其他各种价值。我们在校本课程决策中,需要以“崇高”为核心,将传统价值加以提炼、整合、提升,并融入新的要素,形成一个积极的价值体系,并将之传递下去。通过这种传递,可以从根本上维系中华民族精神。

2. 促进文化精神更新

当前,中国面临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大任务。首先,人类社会生活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因此文化精神也需要不断地更新,而中华传统文化在漫长时期内缺少变化和更新,中国早就需要更新文化精神了。其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之中,现在,我们应该超越这种冲突,更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此促进中华文化的更新。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文化更新重任,许多人士都已明确地认识到,例如,著名哲学家俞吾金就从“启蒙的缺失与重建”的角度提倡这种更新。^[12]校本课程决策能够而且应该承担起部分使命的文化精神上的更新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1) 更新最高价值的内涵。如上文所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最高价值是“崇高”,这是值得传递的,不过,这种价值的传递不宜简单地进行,而应该在内涵上加以更新。在传统文化中,崇高的内涵主要有道德高尚、受人尊崇和推重、地位优越等,而今天,我们应该做如下的更新:首先,将“道德高尚”完整化为以道德高尚为核心的人的整个素质,因为人的素质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它既能人成功地创造世界的素质源泉,又没有不可避免的、根本性的消极影响,同时是每个人都能追求并能获得成功的,因此是创造美好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包含了世界上最高的真、善、美,教育的核心使命就是发挥人的潜能,创造这种价值。^[13]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4]这也是将人的素质发展置于社会的核心。其次,将“受人尊崇和推重”大致分化三个方面的基本价值:一是普遍化为“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这种本体性的价值;二是“素质高而受人尊崇和推重”的价值;三是“贡献大而受人尊崇和推重”的价值。再次,弱化或消除过去与等级化社会秩序相适应的“地位优越”这一项内涵。

(2) 以“崇高”这种最高价值为主导,进行其他文化精神的更新。这种更新工作是非常丰富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其一是人格观念的更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格观总的来说是一种依附型人格观,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和当代中国的物质生产、社会秩序、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时代精神,中国应该走向一种独立型人格观,这种人格观强调人的平等,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判断和选择。^[15]其二是精神价值的拓宽。精神价值包括真、善、美三大要素,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此三者的追求是被严重地窄化的:对真的追求基本上被窄化为对“道”的追求,而对“道”的追求又基本上被窄化为对人伦之道的追求;对善的追求也基本上被窄化为对人伦规范及其义理的追求;对美的追求基本上被窄化为对艺能的追求。显然,这是需要拓宽的。其三是对待经验方式的更新。本来,中国早期的文化在对待经验的方式上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尚书·盘庚上》中名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就是一个例子,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创新精神变得很弱,在当今极为强

调创新的时代,必须对此加以更新,强化创新精神。其四是决策范型的更新。在决策范型上,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总的来说缺乏民主精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逐渐形成民主精神,当前中国更是在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而要真正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就需要在整个决策文化中强化民主精神。

3. 促进文化的丰富化

美好社会、美好世界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丰富的文化。尤其是,现在地球已经进入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时代,在此时代,人类活动正成为影响和改变地球的主导力量,^[16]成为建设和创造整个世界的重要力量,人类文化既代表着人类的精神、力量和成就,又正成为整个世界中的重要、高品位的内涵。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以至美好世界,就需要建设丰富的文化。校本课程决策应该促进这一过程。

(1) 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总的来说是具有多元性的:中国文化的发生具有多元性;^[17]中国许多历史时期的文化具有典型的多元性,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朝的初期和中期;当前,中国又进入了新的多元文化的时代。当今的世界也是一个普遍强调多元文化的世界。学校的课程关注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多元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近年来一直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在当前也是一种普遍的趋势。^[18]在当前的中国,校本课程决策具有这方面的使命。

(2) 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在多元文化的时代,各种文化之间容易形成隔阂和冲突,为了消除这种隔阂和冲突,增强各种人群之间的理解、交流与合作,就需要实现跨文化的理解。因此,在教育领域,人们近年来特别重视跨文化教育。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6年发布了《跨文化教育指南》;有些国家正努力在学校开发跨文化教育课程。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突,而且在国内又要时时面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跨文化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校本课程决策应该注重这一点。

三、履行文化使命的主要途径

那么,如何履行校本课程决策的上述文化使

命呢?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其中主要的途径有三:

1. 在校本课程中突出上述文化精神内涵

课程中总是会渗透一定的文化精神内涵的。在当前中国,为了使校本课程决策有效地起到上述文化精神更新的作用,就需要在校本课程中突出相关的文化精神内涵,即以“崇高”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树立和增强独立型人格观;拓宽精神价值;增强创新精神;增强民主精神。这要体现在各个课程要素上。首先,课程目标中要体现这些精神内涵,也就是说要将在学生身上形成这些精神品质作为重要的预期结果。其次,要在课程内容中渗透这些精神内涵。再次,要在学习环境上渗透这些文化精神,使学生持续地受到渗透有这些文化精神的环境的影响。第四,要在学习方式上要体现这些精神内涵,例如,为体现创新的精神,就需要倡导和强化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为体现民主精神,就要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和自主学习。最后,在学习评价中,一要做到上述文化精神内涵在评价指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使评价过程本身体现这些文化精神内涵,例如,为体现民主精神的内涵,评价过程要提高民主性。

2. 重视校本课程决策过程本身的文化特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课程决策本身是一种文化过程,它有形成文化精神的作用。在校本课程决策中,应该充分利用决策过程的这一文化特性,使校本课程决策过程本身履行上述文化使命。尤其要注重以下几点:第一,将校本课程决策与追求“崇高”联系在一起,例如,校本课程决策的主体是教师,在领导教师参与校本课程决策的过程中,要凸显校本课程决策过程中崇高的贡献意识、素质提升意识,因为校本课程决策不仅体现教师的权力,而且要求教师提升其素质;^[19]第二,在校本课程决策中渗透宽广的真、善、美价值,并允许和鼓励决策者们在校本课程决策过程中发展和表现其各方面的理性精神和非理性精神;第三,鼓励校本课程决策中的独立人格表现与发展,如鼓励与专家的平等对话,鼓励各个决策者的独立思考、判断和选择;第四,将校本课程决策与创新联结在一起,强调决策中的各种创新,包括创造属于本校的、适合于特定学生的独特的、崭新的课程,以此发挥和增强决策者们的创新精神;第五,强调校本

课程决策过程的民主性,例如,将各方面有关的人员都吸收到决策中来,如课程决策的参与者应该包括校长、教师、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社区代表、学科专家、课程专家等方面的人员,要让这些方面的人员都在决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3. 整个学校文化建设充分考虑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

近年来,我国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注重学校文化建设。很显然,学校文化建设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应该将学校方方面面的建设加以考虑,其中要充分考虑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另一方面,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只有被纳入到整个学校的文化建设之后,才能得到全面的有效的履行,校本课程决策行为本身也才具有旺盛的生使命力。学校文化建设充分考虑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主要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在整个学校文化建设中,要充分考虑校本课程决策之使命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学校文化的各个层面更新文化精神、促进学校文化的丰富化。例如,为了体现创新精神,就在整个学校文化建设上也开展各种创新活动,以起到与校本课程决策“共振”的作用,增强校本课程决策在创新精神形成上的效果。第二,在整个学校文化中,加强“课程文化”这个领域的建设。学校文化建设的宗旨之一在于塑造学校形象,而课程文化是能够代表学校形象的重要领域之一,我们应该加强这个领域的建设,这主要是:从整个学校文化的视野建设丰富的、高质量的校本课程,并使校本课程充分地体现上述走向更新的文化精神和学校精神。第三,实现课程文化与学校文化其他各个领域的整合,形成一种复合性、整体性的学校文化,使学校具有强大的文化力。

参考文献:

- [1] Patrick Roberts. Cultural Studies in Relation to Curriculum Studies [A]. Craig Kridel. Encyclopedia of CURRICULUM STUDIES[M].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0: 173-174.
- [2] 龚自珍. 尊隐[A]. 龚自珍全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88.
- [3] 虞和平. 中国现代化历程[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361.
- [4] 张岱年, 程宜山.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399.
- [5] 贾馥茗. 教育的本质——什么是真正的教育[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6: 174.
- [6] Jerome Bruner. Culture, mind and education [A]. In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Learning[C]. edited by Knud Illeris. Routledge, 2009: 161.
- [7] 【美】珍妮·奥克斯, 马丁·利普顿. 教学与社会变革[M]. 程亮, 丰继平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55.
- [8] 叶澜. “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389.
- [9] 张宝贵. 学校文化的系统结构解析[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9): 114.
- [10] 高瑞泉. 论中国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向[C]//李灵, 刘杰, 王新春. 中西文化精神与未来走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4, 3.
- [11] 汉语大词典(缩印本)[A].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1799-1801.
- [12] 俞吾金. 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7).
- [13] Joe Winston. Beauty and Education [M].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2010: 84-85.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49.
- [15] 丁念金. 独立型人格建构——人格转型与教育改革[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2: 43-55.
- [16] 余谋昌. 人类世时代的地学文化[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 [17] 李山. 先秦文化史讲义[M]. 北京: 中国书局, 2008: 2-12.
- [18] F. Michael Connelly, Ming Fang He and JoAnn Phillion. The SAGE Handbook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M].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8: 153-197.
- [19] 丁念金. 论教师的课程决策权力[J]. 课程·教材·教法, 2010(7).

(责任校对: 尚金兰)